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 演进与反思

王星霞, 牛丹丹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改革的重心。通过系统梳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 发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直是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主旋律, 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呈现出从单项推进走向综合协同、从地方试点走向政府主导的趋势, 但是却陷入“政策空传”和“体制瓶颈”的双重困境。

[关键词] 人才培养; 体制改革; 政策; 演进; 反思

[中图分类号] G 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8)01-0036-06

DOI:10.13749/j.cnki.cn62-1202/g4.2018.01.005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蓬勃兴起, 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模式的创新、教育观念的更新等都使我国教育在其时代背景下充满活力、焕然一新。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面前, 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迫切要求面前, 突破人才培养体制障碍,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 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 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因此,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在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 发现我国教育改革的总体政策中包含着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内容, 本文以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几次教育政策为历史发展的线索, 回顾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发展历程, 揭示政策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特点与困境, 以期对全面实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有所裨益。

## 一、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演进

### (一) 初步探索期(1985—1998年)

1985年5月19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该讲话引发了人们教育观和人才观的更新。随后,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人才培养的政策举措。同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文件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针对当时人才培养“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 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 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很不够, 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 不少课程内容陈旧, 教学方法死板, 实践环节不被重视, 专业设置过于狭窄等”的问题, 提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 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 提高教学质量。”该政策文件强调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 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确立了教育的重要地位, 而且突出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1993年2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

[收稿日期] 2017-11-18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研究”(2015MZD056)的部分成果; 河南省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及推进策略研究(〔2018〕-JKGHZDZB-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星霞(1974—), 女, 河南商丘人, 教育学博士, 河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文件再次强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该文件明确指出当时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即“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程度不同地脱离实际”等，也指明了人才培养改革的方向，即“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克服学校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象。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升学考试制度，稳步推进小学毕业生就近入学、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制度的改革。”

### （二）初步确立期（1999—2009年）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指出当时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于“面对新的形势，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为此，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刷新了教育界的人才培养观念，由此，人才培养进入崭新的阶段。

200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将人才资源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提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完善分配激励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奖励制度。建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与之前政策文件相比，该政策文件对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理念、评价制度、奖励制度、保障制度、选人用人机制、党管人才原则、人才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较为详细具体，同时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定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对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政策文本中虽然已经逐渐从零星的只言片语到较为系统的论述，但主要侧重仍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改革，并没有从战略高度对人才培养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划。如2001年5月29

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出台，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始了新世纪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三）规范完善期（2010年至今）

2010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人才工作的纲领和指南。

同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把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被认为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突出亮点。这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教育体制划分为办学体制、投入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几类，人才培养虽然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却只被作为“活动”“工作”“方案”“模式”看待。<sup>[1]</sup>而《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人才培养体制”，并将其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详加论述，可见与人才培养相关的制度已经被放到“根本性、全局性的组织管理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具体行动有：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推进教学方式改革，大力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在职业教育领域，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成立43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建行业性职教集团400多个；在高等教育领域，遴选19所高校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支持和鼓励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立志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在193所高校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启动卓越医生、卓越法律人才等教育培养计划，系统设计“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鼓励高校探索与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合作育人的新模式。遴选17所高校启动试点学院综合改革，进行招生制度、培养模式、管理方式、教师聘任等方面的整体改革探索。

201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强调：“必

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并从人才管理体制、培养支持机制、评价机制、流动机制、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引才用才机制、人才优先发展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全面指导。该政策文件是我国首个针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综合性文件，更是人才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它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优化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双向流动，鼓励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强化人才激励机制，突出创新创业导向。这些改革举措夯实了我国人才发展的制度性基础，为人才的培养和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总体而言，人才培养体制在认识层面已经被放到“根本性、全局性的组织管理制度”的高度，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就如何突破人才培养的体制障碍也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虽然还不足够和完善，但对目前的人才培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 二、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发展特点

（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直是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主旋律

回顾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一直在路上，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1983 年，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国情，世界各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竞争的世情，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战略指导方针，开始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改革。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准备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就向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之后，国家层面

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课程和考试评价改革的文件。如，国家教委发出《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试验工作的通知》《关于试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关于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等。人才培养改革注重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注重课程目标、内容、结构等更加适应各地需求与国家发展需求，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案，增加了‘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课程形式……建立了中学升学和会考等省级教育评价机制。”<sup>[2]</sup>然而，随着课程改革和考试制度的完备，人们对人才培养过程中以知识性学业考试成绩进行分类分流的认同越来越强，“应试教育”逐渐成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大弊病。基于此，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1999 年 1 月国务院批转《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素质教育的育人目标。1999 年 6 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在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世界性结构变化的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不失时机地进入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新阶段。2001 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提出了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更是直接提出“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的政策主张，将教育领域的改革创新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力，积极回应新时代对人才提出的新需求。2014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16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式发

布，被称为中国人才培养目标的 3.0 版。核心素养统领下的新一轮综合改革，必定引起学校教育以“育人模式重构”为中心的深刻变革，“即学校教育必须转型，从‘分数教育’向‘核心素养教育’转变，从‘塑造教育’向‘自主教育’转变，从‘灌输教育’向‘创新教育’转变。”<sup>[3]</sup>

(二) 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从单项推进走向综合协同

历史地看，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经历了从单项推进即碎片化、零散型的政策到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政策出台的历程，呈现出渐进式发展特征。在改革的起始阶段，由于经验的缺乏和认识上的不足，也由于急于调动和鼓励人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改革政策多是教育领域的单项改革政策，如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它们都是在零散、孤立的状态下进行的局部教育改革尝试，较少关注各项改革政策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性和综合协同性。

随着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渐渐认识到，除了教育自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外，“教育自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不同部分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难以割断的联系，因而教育的任何方面的真正改变都受制于、并呼唤着其他相关方面的必要改变，且教育的任何方面的改变也必将影响其他相关方面。”<sup>[4]</sup>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导致不同群体之间价值理念的分歧、利益诉求的矛盾、体制与机制等方面的掣肘等，这都使得任何的单项教育改革进展迟缓，推进困难，甚至是举步维艰，进入所谓的高原期、“深水区”。正因如此，人们才深刻地意识到，“零散的独自进行的任何教育改革几乎都不可能真正取得完全成功。有时，某项或某些零散的独自进行的教育改革看起来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但由于与之关联的其他方面并未进行相互关联的必要改革，原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因而这些所谓的成功都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且几无例外地都因得不到与之关联的其他方面的必要呼应而难以为继，以至于偃旗息鼓，甚至回到改革前的状况。”<sup>[4]</sup><sup>[21]</sup>正如《教育部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所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涉及面更广、关联度更高，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度更大，许多问题解决起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涉及多种政策配套，涉及多方利益调整，靠原来的单项改革办法或局部突破套路已难以奏效。”

于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为当今中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一种必然选择。没有改革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教育，没有综合改革的教育同样没有出路。“要用系统思维、全局意识和全球视野认识改革，用普遍联系观点设计改革，用统筹兼顾办法推进改革，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sup>[5]</sup>成为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红心和主线，也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三) 中央政府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试验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试验一直倾向于提倡发挥地方教育机构的首创精神，即鼓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的自主创新，期待能通过地方自发的教育改革试验——中央事后确认并推广的模式完成教育的任务。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以后，各地以此为依据，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了“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不同形式的办学体制改革试验。

2001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各地要建立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学校，探索、实验并推广新课程教材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各地要建设一批实施素质教育的示范性普通高中。有条件的普通高中可与高等学校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家层面的积极鼓励，各地教育学人的教育试验的热情不断高涨，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改革模式和地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教改浪潮，如杜郎口教学模式、铜陵模式等。但多年的试验经验表明，推广地方政策试验经验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如下：“一是局部性经验与当地自然、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离开当地的条件盲目进行经验推广的可行性较低。二是许多地方政策试验的成果在本质上是特殊政策支持的结果，本身就不具备推广的可能性。三是一些典型经验本身就是过度包装和宣传的产物，甚至大量的‘伪创新’。”<sup>[6]</sup>

认识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加强了顶层设计，不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教育改革方式。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十大改革试点基本任务。纲要指出，“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统筹规

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了425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部分区域和学校开展了包括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政策试验。将以往的注重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试验模式逐渐转变为强调“中央规划统筹——地方探索验证——中央评控推广”<sup>[7]</sup>的上下结合模式。

这些都表明，“中央对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并且明确提出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以往‘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单线突进’改革方式的重大调整，因为传统的改革方式既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无法有效推进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改革任务。”<sup>[6]</sup>

### 三、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困境

（一）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空传”现象严重

“在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甚为普遍的现象，即‘文件归文件，实践归实践’。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与素质教育有关的改革文件的出台与实施状况尤为典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为促进学校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出台了一份又一份文件，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直到对政府教育部门的政绩考核，一次又一次提出改革要求，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三令五申。然而，时至今日，应是停留在口号上、会议中。”<sup>[4]</sup><sup>[7]</sup>吴康宁教授的感受是关于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实施现状的。这种政策实施现状不同于以往政策科学学者们说的“政策变通”或“政策选择性实施”，而更像一种“政策空传”。突出表现为以政策文件贯彻落实文件，并没有将政策任务转化为具体政策目标，政策实施者以下述三种方式对待上级政策：一是逐级以文件传递文件，经过多级传播，中央政府文件权威性在不停地传递中效力减弱；二是政策实施者只是通过电子政务方式下载政策文本，并继续转发或复制政策文本，并未将政策任务转化为符合自身工作实际的新目标；三是尽管政策实施机关再生产了政策文本，但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落实政策内容，实现政策目标。<sup>[8]</sup>李兴洲老师曾谈到我国的“减负”政策的实施情况。他说，从

1993年起，国家教委就颁布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国家教委又颁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仍旧指出“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已成为推进素质教育刻不容缓的问题”。时间倏忽，问题依旧，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仍是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迫切愿望。“在素质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某些学校或某些地方在贯彻落实‘减负’政策时采用的‘挂羊头、卖狗肉’对策，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却依然走着应试教育的老路。”<sup>[9]</sup>

（二）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仍然难破体制瓶颈

吴康宁认为，教育管理体制的障碍是30多年来一直严重制约我国教育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一个要害性制约因素。而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障碍中，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超强控制是其突出表征。不受限制的权力使得政府部门常常将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及评价者等多种身份集于一体，导致学校难以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sup>[4]</sup><sup>[30-31]</sup>

2010年之前，国家教育改革侧重点在办学体制改革。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把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并被认为这是《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众所周知，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中最难啃的骨头就是教育管理体制，就是行政领域的超强干预。也因此，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的存在场域特殊而复杂，政府角色、领导意愿、价值标签、考试竞争、关系网络、社会基础等特殊语汇，构成了中国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政策推进的复杂场域。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是在这些极具复杂性的场域中发生的，更受这些场域的制约。没有这些领域的改革作为配套，只是希望从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打开缺口，效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需要同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各种评价考核制度等相关的体制、制度协同推进，才能切实

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吴越. 规划纲要最耀眼的亮点: 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N]. 天津教育报, 2010-05-12 (001).
- [2] 杨志成. 新中国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研究——政策生态学视角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53.
- [3] 教育 3.0 时代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http://news.ifeng.com/a/20161123/50300251\\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1123/50300251_0.shtml)
- [4] 吴康宁. 教育改革的“中国问题”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11.
- [5] 教育部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29/201303/148072.html>
- [6] 吴昊, 温天力. 中国地方政策试验式改革的优势与局限性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 (10): 37—45.
- [8] 肖凤翔, 于晨, 邓小华. 中央主导下的地方教育政策试验: 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7): 23—30.
- [9] 李瑞昌. 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研究 [J]. 公共政策评论, 2012 (3): 60—85.
- [9] 李兴洲. 教育制度的习得性失效及其矫治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 12—19.

## The Evolu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Policies on Reform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ince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in China

WANG Xing-xia, NIU Dan-d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PRC)

[Abstract]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talents training, reforming its mode and improving its qualit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ese educational refor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olicies of talent training reform shows that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theme of the policies on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policies have evolved from single policy stage to the stage of pursuing the synergetic effects of policies, from the stage of experiment at the local level to the government-led stage. However, the reform is currently facing the dilemma of “unimplemented policies” and “a bottle-neck in system”.

[Key words] the policy on talent training system reform; evolutio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水心)